

##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文光

(云南大学 研究生部,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本文分为4个部分, 详细回顾了古代、近代和现代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情况, 总结了研究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并展望了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未来。

**关键词:** 西南民族史; 回顾; 展望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03) 01-01-13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自古拥有为数众多的民族。数千年来, 各民族既创造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 又共同创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发展的辉煌历史, 而中国西南各民族对创造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曾作出巨大贡献, 故中国西南民族史自当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按习惯的说法, 中国西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西南”指今天的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重庆市, 而广义的“中国西南”则还包括西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但在传统的西南民族史研究中, 常以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为主, 兼及历史上曾置于中国政府管辖下半岛北部的一部分。方国瑜先生曾说: “西南地区的范围, 即在今云南全省, 又四川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 这是汉代至元代我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 西汉为西南夷, 魏晋为南中, 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 沿到元代为云南行省, 各个时期疆界虽有出入, 而大体相同。”<sup>[1](P1)</sup>当然, 由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与西藏、广西相邻, 故在具体研究中对西藏、广西也会有所涉及。但由于藏族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故一般都不将西藏纳入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范围。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曾经在西南活动现已消亡的民族、以及通过几千年来民族分化与融合, 到现在所形成的壮族、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布朗族、毛南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等三十余个少数民族。

对上述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 构成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如果再进一步概括的话, 则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内容大致包括古今西南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与文化演变、民族关系史、各民族通史、专题史、边疆史、跨境民族史和与各民族相关的历史文献学研究。

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 云南大学是走在前列的。1954年, 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 指示云南大学要加强地方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 方国瑜教授率先开出《云南民族史》课程, 成立了教研室、研究室, 培养了大批民族史研究的专门人才。1979年底, 经云南省委批准, 云南大学成立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 以所长尤中教授为首的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西南民

族史研究的论著。至此，经云、贵、川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西南民族史成为了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前，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在云南大学已具有人才资源集中、资料收藏丰富、研究方法灵活、跨学科联系密切、研究成果显著的特色，在学科领域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员。

今天对中国西南民族史的发展做一个简要回顾，力求勾勒出其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西南民族史作些展望，这对学科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sup>1</sup>

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就有关于夷、羌的零星记载。其他如《左传》、《淮南子》、《国语》、《尚书》、《诗经》、《世本》、《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对西南民族的记载日增且渐详。

秦汉国家政权的建立，不仅统一了华夏族，也直接统一了周边的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也与“诸华”一样，设置了郡县进行统治，从而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因此，如何有效地从政治上治理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县，就成了史家对民族历史特别关注的一个政治动因。此后，专门以少数民族为对象，更全面、系统地记述其历史源流、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服饰发型、生活习俗等的著作，便在历代编修的“正史”中出现，这便是二十四史中的《四裔传》，首创者为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说：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由此他写出研究西南民族史的第一个部著《史记·西南夷列传》。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里程碑式的著作。

司马迁首创《四裔传》后，历代修史者皆效法之。所以整个二十五史除《陈书》和《北齐书》外，都有少数民族的专传。关于西南民族历史的专传或相关记载，除《史记·西南夷列传》外，还有：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三国志》虽无关于西南民族的专传，但却已有大量关于西南民族历史情况散见于《诸葛亮传》、《霍峻传》、《吕凯传》、《李恢传》中；

《晋书》有《南蛮传》，但由于南北朝汉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对西南难于进行有效统治，故无西南夷传，仅在《南蛮传》中有一些记载；

由于同样的原因，与北朝有关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重北方民族的记载，但《魏书》第一次专门为西南的僚族立了专传，即《魏书·僚传》；

《周书》将少数民族传记归入异域传，但多为转抄《北史》、《魏书》，故无特色；

《北史·南蛮传》；

《宋书》有《夷蛮列传》，但从文中所记来看，夷主要指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的民族，而蛮则仅指荆雍州蛮和豫州蛮（当为今苗、瑶、土家等族的先民）；

《南齐书》有《蛮传》、《氐传》、《羌传》；

《梁书》虽有少数民族专传，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很少；

《南史》虽有《南蛮传》，但由于其以《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删节、补充而成，无新材料；

《隋书》有《南蛮传》，但由于对西南统治不深入，故对西南民族的记载甚少，反而在《隋书·地理志》中有所记录；

《旧唐书》有《吐蕃传》（上、下）、《南蛮西南夷传》；

《新唐书》有《吐蕃传》（上、下）、《南蛮传》（上、中、下）；

《旧五代史》将有关西南民族历史记入《外国传》中；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记录有关西南民族历史；

《辽史》无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专传，仅在《部族志》、《属国志》中有零星记载；

《宋史》有《蛮夷传》（一至四），但关于大理国的情况却载入《外国传》；

《金史》无西南民族专传，地理辽远之故；

《元史》对西南民族的处理特别，即虽无西南民族专传，但却将西南民族放到《地理志》（三、四、六）中；

《明史》亦无西南民族专传，而是将西南民族放入《四川土司传》（一至三）、《云南土司传》（一至三）、《贵州土司传》中；

《清史稿》与《明史》同，将西南民族放入《四川土司传》、《云南土司传》、《贵州土司传》中。

通过以上的排列我们可以看出：当内地汉民族政权或其他非汉族政权强大时，与西南民族的政治联系就紧密，反映在文献上记载也就详细，如《新唐书·南蛮传》就有上、中、下三篇。

除上述各朝正史中有西南民族的专传外，历代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南民族的记载，较为重要的如常璩的《华阳国志》，樊绰的《蛮书》，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田雯的《黔书》，李京的《云南志略》，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李心衡的《金川琐记》，姚莹的《康輶纪行》，陈浩作的《黔苗图说》，无名氏作的《土官底簿》，郭松年的《大理行记》，龚柴的《云南考略》，肖石斋的《乌蒙纪年》，无名氏的《乌蒙秘闻》，刘彬的《永昌土司论》，赵翼的《平定金川述略》，魏源的《西南夷改流记》，无名氏的《招捕总录》，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余庆远的《维西见闻记》等。上述文献大多根据作者调查所成，虽然写作目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史研究，但学术价值很大。

中国西南的地上和地下还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民族历史的遗存和遗物，如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云南楚雄万家坝遗址，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大理太和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和遗物为研究西南民族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历代遗留下来的摩崖碑刻也保存了许多十分可靠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如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这些特殊载体的文献，可与史料相印证。

通过以上的回顾，大致可以将古代对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作以下几点归纳：

1、在文献记载和史家的研究中，都从大民族主义统治者的角度，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

和浓厚的政治色彩,缺乏客观性,表现出“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民族史观。

2、注意族源的论述,经济文化反映不够,故一般性的叙述较多,缺乏深度。

3、由于史家从大民族主义出发,从政治统治着眼,故文献中或以描写政治对抗为主,或以描写落后的“蛮夷”习俗为多,认识上有片面性。

4、所有的研究还处于自发的、不自觉的阶段。

5、虽然研究西南民族史的文献众多,但缺乏系统,加之民族融合现象普遍,故文献中难以看清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所以欧美、日本、俄国的一些学者、传教士、探险家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部分人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主要有:<sup>[2](61-72)</sup>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清末在云南、贵州、四川对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进行调查,写出了《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英国人丁格尔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西南,对汉族、苗族、彝族、白族作了亲自观察,写成了《丁格尔步行中国记》,书中多有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英国人立德清末到川边及云南,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和《穿过云南》;英国人烈敦著有《中国:川北旅行报告》;英国人戴维斯清末多次到云南,著有《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间的链环》;英国人克拉克在云南调查后,著有《在中国西南诸部落中》。

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外国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的激励下,唤发了部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强精神。而且面对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危亡,学者们对民族研究更加注重,这对国内学者研究西南民族史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近代中国著名学者中,较早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史的人是梁启超。他先后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三苗九黎蚩尤考》、《春秋夷蛮戎狄考》、《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在上述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梁启超花了很大篇幅来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对族属源流的研究颇有见地,对西南民族研究的许多结论,至今仍可为定论,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已开始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名称和研究任务。

二十世纪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时期,是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开拓到成果众多的时期。如果从时间上划分,二十世纪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可分为两阶段。前五十年为第一阶段,后五十年为第二阶段。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前五十年,部分成果是在实地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如1914年,丁文江在对云南和四川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后,在《独立》杂志上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论文;1928年夏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杨成志到云南进行了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民族调查,回广州后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其他还有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

当然,由于中国史学的特定学术传统,更多的西南民族史研究还是以文献为主要依据,兼及实地调查。其主要论著有:

夏光南《云南文化史》;

凌纯声 1938年发表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  
陶云逵的《云南的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  
马长寿的《川康民族分类》；  
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  
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和《旅边杂著》；  
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  
范文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  
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  
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  
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丁文江《爨文丛刻》；  
李佛一的《车里》。

此外，许多全国性的民族史专著、专论，都有对西南民族史的研究章节，如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文化》和《中国边疆民族》、卫惠林的《中国民族分类略论》、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芮逸夫的《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等。

中国西南民族史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建设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1年，四川大学设置了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1935年，四川大学又设立了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1934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拨出专款，在云南大学等六所大学中，设立了边疆史地研究室。

抗战爆发后，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向西南地区转移，主要集中在昆明、重庆、成都、贵阳。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结合文献记载，进行民族调查。由于研究者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士，所以研究质量较高，将西南民族史研究在学术范式、深度、广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各地比较突出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有：<sup>[2](P54-55)</sup>

昆明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主要的学术研究中心。西南联大设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出版了《边疆人文》三卷。云南大学建立了方国瑜等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丛书”。

迁至成都的大学较多，专家集中，学术活跃，出版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

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重点研究苗族，出版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今凯里）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

在上述学术活动中，许多学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完成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馆合作组成了川康民族考察团，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下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其后，马长寿又深入大、小凉山调查，写下了《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凉山罗夷的宗谱》。任乃强在西康调查后，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论著。1943年，林耀华在大凉山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家》，1944年又对康北藏族深入调查，写成了调查报告《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

江应樑在对四川、云南的彝族进行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

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也结合自己的专业，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多学科综合的民族史研究论文，如罗常培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又如闻宥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么些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研究西南民族史颇有价值，弥补了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学者们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便将在西南期间的研究作进一步整理，理论上也作了些总结，如费孝通将他在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报告合写成英文著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林耀华在1947年出版了《凉山夷家》、《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四土嘉戎》；江应樑在1948年出版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摆夷的经济生活》、《西南经济文化论丛》。

二十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与古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从以下几点表现出来：

第一，从民族史观上看，大部分研究者虽然没有完全杜绝华夏中心论和民族歧视心理，但注重各民族的平等，强调研究要为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服务。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阴影之下，中国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有利于反对列强，这是民族史观的重大进步。因此，学者们不再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再侧重于政治统治，而是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进行学术研究。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已开始超越旧有的族源、政治斗争等范围，向经济、文化等领域渗透，研究更加专门化，学术研究开始规范，许多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学术观点、学术概念被吸收到民族史研究中来。出现了很多专论和专著，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有所提高。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已开始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同时也开始利用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之来丰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

第四，与古代相比，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参加研究的人多为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学者，因此，研究的面宽且有一定深度。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从理论上讲，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应该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50年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至少在学科发展、研究方向、方法上都有负面影响，政治常常左右着学术研究。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西南民族史研究应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特定背景，将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49年至1959年，第二时期为1959年至1978年，第三个时期为1978年至二十世纪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各高校、各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建国初的民族研究工作，学者们在认真参加思想改造的同时，还积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努力工作，报效国家。如1950年，冯汉骥由成都前往重庆，担任西南博物院副院长，在四川的理县、威州等地进行与少数民族起源有关的考古发掘；1951年夏，云南大学杨堃和刘尧汉一起带学生到武定对苗族、彝族进行调查；1952年、1953年，马曜两次到景颇族地区调查。

1950年至1952年，中共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东北内蒙古民族访问团，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了解民族地区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1950年6月，

西南访问团分三个分团，分别访问西康（一分团）、云南（二分团）、贵州（三分团）。访问结束后，将访问过程中的调查资料整理成《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后来又将其关于西双版纳的调查资料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一书中，再后又将访问团的调查资料编为《中央访问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西南三分团在贵州访问结束后，也写成了调查报告《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后来又出版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sup>[2](P54-551)</sup>

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面对民族状况不清，民族认同混乱，不利于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这一现实情况，提出了民族识别的工作任务，西南是此项工作的重点。1954年5月到10月，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的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地，对彝族、壮族、傣族、哈尼族的支系进行民族归并和调查；1955年4月至8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受中央民委的委托组成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提出穿青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仡佬族是一个单独民族的民族识别意见。此后，通过实地调查和情况分析、比较、识别、归并，又识别了西南的仡佬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毛南族、基诺族。

1979年又开展了对一些未识别民族群体的调查，如四川民委组织对平武县“达布人”的识别调查，对凉山“西番人”的调查；云南也组织了对苦聪人、克木人等的调查。1982年，詹承绪、刘龙初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对白族的两个支系勒墨和那马进行调查。

通过民族识别，各少数民族各项权力最起码在政治上、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和落实。但民族识别也在学术上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如有将理论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个别地方的识别工作过份强调族源和血统；对本民族意愿不够尊重的情况也个别存在；生硬地按行政区进行识别，结果出现了云南的普米人识别为单一民族，四川的普米则归入藏族，云南的摩梭人归入纳西族，而四川的部分识别为蒙古族等不相一至的情况。

1956年，中共中央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西南的四川调查组划分为凉山分组、甘孜分组、阿坝分组和羌族小组、苗族小组；贵州调查组下分十个小组；云南调查组下分六个调查分组和七个资料收集组。通过这次调查，系统地了解了西南三十余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风俗习惯。这次调查对制定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方针，以及形成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培养了一支学术中坚队伍，准备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

除了上述中央访问团访问、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参加外，各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在机构设置、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了一大批成果。

中央民族学院建立后，又在其下设立了研究部，研究部中有西南研究室。1954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机构调整，按相近民族划分，合并为三个研究室，其中的第二、第三研究室都与西南民族史研究有关，发表了专门研究西南民族史的论著，如高加乐的《南诏和彝族的关系》、石钟健的《南诏简史》、刘尧汉的《彝族图腾研究》、周汝诚的《纳西族的民族关系》、汪明瑀的《云南土家、普拉、腊鲁、米利调查材料》和《云南西番族调查报告》。

1954年，云南省民委建立了民族研究室。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也都做了专门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专门计划。

1956年，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对少数民族历史格外重视，要编纂少数民族通史、简史、古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在此背景下，1959年云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

民族史专门化”(专业方向),稍后又改为“云南民族史专门化”,同时又建立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开设了“云南民族史”、“云南历代土司制度”等课程。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西南民族史研究有了新进展。1973年,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马曜等人开始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7年出版)。1977年,杜玉亭建议组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通过几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认定基诺族为单一民族。1977年,贵州的侯哲安、李衍垣组织了大型的“夜郎史”讨论会。

1978年后,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国家民委召开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规划会议,并成立了丛书编委会,这项工作对促进西南民族史研究意义重大。此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了自已的简史、简志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西南地区由于民族众多,是民族研究的理想之地,所以,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成立了中国民族研究学会。之后的1981年10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在昆明召开首届年会,会议决定由学会组织综合考察队进行调查工作。会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沿怒江逆行,到达滇藏交界区进行调查,发表了《独龙族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四川的民族研究专家李绍民、童恩正等对雅砻江下游进行试点考察;贵州的柏果成对月亮山地区也进行了试点考察。

1983年,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和贵州民族研究会发起,又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参加的月亮山区域综合考察,写出了五十余万字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民族关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有了更深的认识。

随着调查研究的大规模展开,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学术活动向纵深发展。1983年5月,中国民族史学会在北京成立;1984年11月,云南省举办了第一期民族调查讲习班;1985年8月,全国彝族学术讨论会在四川西昌召开;1987年8月,经民族识别,确认苦聪人为拉祜族支系;1987年9月,苗族瑶族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1990年10月,西南民族原始宗教与民间文学讨论会在四川广元举行。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达到高潮时期,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学术专著不断出版,各地还相继建立了能反映西南民族历史的博物馆。

从1990年至2000年所召开的国内重要学术讨论会和我国学者参加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主要有:贵州毕节地区苗族研究会的第二次年会,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侗学会研讨会,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第六次协作会暨首界学术会议,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五次专题学术讨论会,滇西岩画研讨会,云南省傈僳族研究会首届年会,中国云南傣戏文化国际研讨会,四川省藏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彝海结盟”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彝族暨彝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学术讨论会,首届云南傣族学学术研讨会,首届哈尼族文化中际学术讨论会,夜郎学术研讨会,白族学学会学术年会等。

各地建立的博物馆主要有:四川大学博物馆,西南民族学院博物馆,茂县羌族博物馆,云南省民族博物馆,云南省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铜仁侗文化博物馆,贵州民族婚俗博物馆,大方彝文碑陈列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博物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上郎德苗族村寨博物馆,镇远青龙洞民族建筑博物馆,贵州黄平飞云崖民族节日博物馆,贵州平坝天台山民族戏剧博物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市博物馆,丽江纳西族博物馆。

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论文多得难以统计,现将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重要著作简列于下: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上、中、下)、《云南郡县两千年》、《彝族史稿》,江应樑《傣族史》、《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和土司》,尤中《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地方沿革史》、《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契古通记浅述校注》,杜玉亭《基诺族简史》、《云南蒙古族简史》,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从西双版纳看西周》,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李绍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历史调查综合报告》、《文明中国的十月历》,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论文集》,宋兆麟等《永宁纳西族母系制》,田继周《西盟佤族社会形态》、《佤族简史》,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童恩正西南考古论文集》,汪宁生《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考古》,张增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吴恒主编《彝族简史》,向零《侗族简史》,严汝娴等《永宁纳西族母系制》、《普米族简史》、《哈尼族简史》,詹承绪等《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张公瑾《中国的傣族》、《傣族文化》,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邓少琴《巴蜀古史论述》,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董其祥《巴史新考》,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朱俊明《夜郎史稿》,贵州哲学社科所编《夜郎考》(三卷),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集》,郭大烈《纳西族史》,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李衍垣著《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胡庆钧著《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志补注》,贵州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向达《蛮书校注》,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王叔武《大理行记校注》,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江应樑《百夷传校注》,杨岭多吉主编《四川藏学研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彝文典籍目录》,贾银忠《彝族饮食文化》,朱崇先《彝族典籍文化》,罗世保《怒江民族文化研究》,王尔松《哈尼族文化研究》,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郭大烈等编《瑶族文化研究》,王光荣《彝族祖先信仰研究》,赵鸿昌《南诏编年史稿》,王正贤《彝史精编》,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雀丹《嘉戎藏族史志》,李昆声《云南艺术史》,吕大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彝族卷、白族卷、基诺族卷》,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李廷贵《苗族历史与文化》,刀国栋《傣族历史文化漫谭》,金少萍《云南民族历史文化探讨》,李国文《东巴文化辞典》,罗世庆《贵州仡佬族》,陈国新主编《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郭家骥主编《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杨福泉《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张福《彝族古代文化史》,冯祖贻《侗族文化研究》,刘之侠《水族文化研究》,陈天俊《仡佬族文化研究》,韦启光《布依族文化研究》等。

通过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溯,可看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前五十年相比,后五十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西南民族史研究内容扩大,涵盖面更广,表现出思路开阔,新论迭出的格局,能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有学术自由,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研究者都能自觉地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学术研究。学科队伍有所扩大,中青年学术力量在学历层次上有整体性提高,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西南民族史研究理论上有所发展、创新,如原来认为南诏国、大理国是割据政权,这表面上看是维护统一,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南诏国、大理国应是与汉民族建立的唐朝、宋朝具有一样的历史地位,同样是当时中国境内不同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包括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第三,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专家学者大多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理论与现实结合,强调学术对社会的贡献,但许多理论并未被实际工作部门接受,学术对社会的贡献尚

未完全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第四，实地调查研究更受重视，注重社会历史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民族识别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成绩；数量众多的调查报告为西南民族史研究，特别是为现当代西南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在新中国方志编纂中也派上了大用场。

第五，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员，重视整理、保护、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重视与民族史研究相关文献的整理、释注。

第六，较多地采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同时也兼顾研究对象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虽然二十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大多数成果主要还是以研究古代为主，研究内容也较为传统，主要集中在族源、族称、民族关系、民族政权方面。即使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仍偏重于旧有论题，许多领域或不深入，或尚待开发，如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专题研究就比较薄弱，缺乏有分量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探索，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不多，当代民族史几乎是空白。应用性研究虽然得到加强，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浮浅性。因此，展望未来，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仍是任重道远的。

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始，如何发挥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优势，使西南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良多，现择其要点，简述如下。

### 1、立足西南现实关注学术的未来走向

对当代的西南民族史研究者来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南民族历史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涉及物质的西南民族历史，又涉及精神的西南民族历史。尽管我们对古代历史还要不断地加深认识，但最重要的是关注现实，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才是研究的主体和一切研究的归宿，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一切活着的人和一切活着的现实。所以，应重视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现实取向，重视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的西南民族发展史，与各民族历史上所经历的漫长岁月相比，是日新月异的，所以对当代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家形势的发展，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也都要求要加强当代民族史研究，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 2、重视学科的基础研究，拓展研究的新领域和方向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许多基础研究还需加强。首先是仍需继续加强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彝人史、叟人史、昆明人史、白蛮史、乌蛮史的专史研究上。其次还应加强对各民族通史的研究，西南民族多有简史但无详史。为了让基础研究做得更好，还应充分吸收相近学科的成果，拓宽民族史新的研究领域，创建一批交叉、边缘的学术领域，注意与相关学科的交流、渗透。目前，相关学科中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正快速发展，使西南民族史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

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角度看，目前急需加强的是专史研究，如民族艺术史、民族经济史、民族思想史、民族教育史、民族科技史、民族社会生活史、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史、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史等研究课题。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研究也应给予

足够的重视。

### 3、注意利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文献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图书馆的出现，使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场巨大变革。尽管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个体劳动特点变化不大，但以往的学术研究手段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由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学科交融性、多学科性、系统性、文献信息处理的科学技术化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如充分利用数字化图书馆、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就是目前获取和利用文献的有效途径。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忽略对西南民族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和出版工作。

### 4、注重学科建设加强宏观研究

克服民族史研究中就史论史，与现实脱节的片面性，既要注重史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科学性，研究以精深为本，重视对民族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特点、原因的研究，又要考虑学术对社会的贡献。

通过民族史的研究，着力加强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对边疆的稳定和保证国家的统一意义十分重大。因此，研究中国西南各民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过程这样的课题就显得日益重要。

此外，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所以应将西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研究。

### 5、加强汉民族和跨境民族研究的力度

在整个西南民族地区，汉族作为地区主体民族的时间很短，约始于明代。但由于“内华夏，外夷狄”思想的潜在影响，所以长时间以来，西南民族史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因此，下一步一方面要克服汉民族政权正统论的片面史观，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忽视汉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建设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片面认识。

西南有十余个民族为跨境民族，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民族源流、古代民族关系方面，但对当代跨境民族的民族关系、国家观念等问题研究，基本涉及不多，应加强之。

我们已经进入令人神往的二十一世纪，通过对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目前必须不失时机地研究西南民族史的走向和所面临的任務，它决定着我們能否准确地把握未來的學科發展方向，完成好我們對西南民族史研究所肩負的責任。相信本次大會的召開和各位專家學者的光臨指導，一定會對中國西南民族史研究大有促進，使之走向輝煌的明天。

### 参考文献

[1] 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2] 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史[M]. 云南: 云南教育出版社,1977.

## Review and Prospect for Researches on History of Chinese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WANG Wen-guang

(Depart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t reviews in details the situations tha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tudi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from ancient times and modern times. It also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these research work. At the same time, it look forward for the future of the research on history of Chinese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southwest ethnic minority; review; prospects

(责任编辑 晓斌)

收稿日期:2002-12-18

作者简介:王文光(1955-)男,博士,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云南大学研究生部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

---

<sup>1</sup>本文仅是对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因此未能对相关专家学者及其论著进行全面介绍,特此说明。

<sup>2</sup>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多次引用过《中国民族学史》中的一些统计资料,由于太零散,没有一一作注,特此说明。